

# 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选择与动员策略

花 茜 章利华\*

**【摘 要】**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一环，其在“落地”实施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和参与度不高；二是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平衡，偏离民众日常文化诉求；三是乡村文化人才资源匮乏，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内动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一些乡村地区，主动吸纳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事业，成为化解村落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和人才资源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的动员策略来看，依照其身份优势可划分为“富、文、德、技”四种不同类型。通过发挥主体自觉性，将不同类型的新乡贤群体纳入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的整体治理框架之下，进而促进政府决策导向、基层治理单元与新乡贤动员策略之间的合流。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新乡贤；乡村振兴；动员策略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2.12.002

##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美丽乡村”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普通民众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愈发迫切。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不仅有助于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也发挥着关键的价值引领作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一环，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工作十分重视。如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sup>①</sup>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sup>②</sup>目前，学界有关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

\* 花茜，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新农学院副院长；章利华，南京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资产公司副总经理。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和方式研究”（编号：18BSH024）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新华网，[http://www.moa.gov.cn/xw/zwtd/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http://www.moa.gov.cn/xw/zwtd/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访问日期：2022年6月5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网，[http://www.cidca.gov.cn/2020-11/05/c\\_1210874463.htm](http://www.cidca.gov.cn/2020-11/05/c_1210874463.htm)，访问日期：2022年6月10日。



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sup>①</sup>村民本应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但随着乡村大量劳动力的外迁,只剩下“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行政力量更多的是单方面输入,使得社会文化组织的参与性和乡村民众的主体性未充分体现,<sup>②</sup>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未充分激活。

二是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平衡,偏离民众日常文化诉求。贺雪峰指出,当前乡村中,农民有着大量的闲暇时间,如果能够将这些时间充分利用,则能极大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sup>③</sup>但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在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与民众实际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了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无法与乡村实际的公共文化需求相契合,出现了设施落后、内容单一、服务频率低等失衡现象。在某些乡村,政府出资修建的农家书屋、健身中心、村民礼堂等公共文化场所“形同虚设”,更多的村民自发地聚集在棋牌室、麻将馆甚至小卖铺的电视前。此外,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是有所差异的,只针对某一年龄层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满足全年龄层的文化需求。再加上乡村缺乏公共文化落地的组织者,相关公共文化的建设总是在村委与民众之间“悬浮”,无法真正做到文化下沉。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力量无法全方位地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进行资金帮扶,且在投入过程中存在重复、移项和分散使用资金的问题。在资金不足、使用效率低下、监管不严等多重问题的压力下,标准化、常态化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成只能是一纸空谈。

三是乡村文化人才资源匮乏,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动力不足。田毅鹏指出,在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农业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都会导致乡村出现“过疏化”的特征,<sup>④</sup>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当前不少乡村的人才建设体系存在“村级带头人结构老化、发展能力滞后、后备人才匮乏、大学生村官机制不完善”<sup>⑤</sup>等诸多问题。人才的缺失不仅让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难以为继,更会导致民众对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缺乏热情。青少年是乡村的未来,但他们却对本村公共文化事业并不了解,没有完全唤醒他们的文化自觉。<sup>⑥</sup>因此,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的过程中,难免缺少新生力量对乡村公共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乡村公共文化缺少“传”的乡村组织者和“承”的新生力量,“根”与“魂”的传统自然难以为续,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情感出现“分层”“断层”,甚至面临着消亡的风险。

① 孟祥林:《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 蒋利雪、李敏:《社会治理视域下乡村文化传承问题与对策》,《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③ 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④ 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⑤ 郭华良:《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群众》2018年第14期。

⑥ 张梦洁、黎昕:《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路径探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三、新乡贤：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选择逻辑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度较低、政府权力难以下沉等固然是阻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客观事实，但乡村人才的巨大缺口才是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对外来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则要注重对本土乡村精英的挖掘与任用，学界将这一类乡村精英统称为“新乡贤”。胡鹏辉和高继波认为，“新乡贤”就是“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sup>①</sup>他们不仅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同时也拥有较好的教育水平、热心乡里事务的意愿等；从地理范畴看，在本土的生活经历或籍贯隶属是大部分新乡贤获得村落认可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乡土性也多被视为当代新乡贤群体维系情感诉求的根本要素。<sup>②</sup>

#### （一）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抓手

新乡贤群体为何能够成为当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之一？事实上，各类文化资本的占有，是新乡贤群体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前提条件。布迪厄延伸了经济学对于“资本”的定义，指出“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在私人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并不否定“资本”的经济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其细分为三种形态，分别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可按一定比率相互转换，如在缺乏一定经济资本的情况下，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亦可以有效地参与日常生活，这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新乡贤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我们称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二是以图片、书籍、词典等文化载体形式；三是以文化资格证书之类的形式。自古以来，相较于普通乡民而言，乡贤群体所占有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新乡贤们拥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以及书籍、字画等文化载体，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在乡村建立“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提高乡村的文化建设水平。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拓展传统乡贤范畴的基础上，文化资本也随着语境的改变而被不断扩展。其次，新乡贤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本，他们或直接捐助一定的资金、或组织成立各类形式的基金会、或为乡村提供无息贷款、或在当地创造就业条件等，为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保障，并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建设添砖加瓦。最后，新乡贤拥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资本。国家的宏大战略有时会与乡村的自身逻辑产生冲突，因此就需要新

<sup>①</sup>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sup>②</sup> 张兴宇：《礼俗化：新乡贤的组织方式及其文化逻辑》，《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乡贤调和其中矛盾,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整合本地资源,以协助公共文化建设真正落地,在这一前提下,新乡贤们所拥有的信任半径<sup>①</sup>会大于一般民众,因此所占有的社会资本也大于一般民众。在布迪厄的概念中,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言之,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sup>②</sup>对乡村生活而言,乡村中的每一个民众由于相同的生活体验共同构建了适用于当地的社会规范,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身处网络中的个体依据社会规范进行日常交往。

当然,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地方权威集中于新乡贤群体,而长期集中的地方性权威又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其一,新乡贤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一个崭新的公共事物能否被地方民众接受,取决于新乡贤群体的态度,在他们的号召之下,民众大多会跟从新乡贤群体的具体实践,这有利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与落成。其二,乡村公共事务所涉及的人、事、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乡村民众私底下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有时也会阻碍公共文化的落成。新乡贤的信任半径要大于一般村民,意即新乡贤的“面子”要优于一般村民,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可以经由新乡贤的调解被妥善化解。例如,在浙江乡村,当地文化大礼堂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规模庞大的文化大礼堂的落成少不了新乡贤的社会关系资源挪用。无论是原本存在或是新建的公共文化空间,只要动用了公共资源,这就容易引发乡村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分歧。此时,新乡贤们或是运用自己的名望劝化乡民,或是运用自身的人际关系推进文化礼堂建设,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使得浙江文化大礼堂成为全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景观之一。<sup>③</sup>

## (二) 地方政府部门的认可支持是新乡贤群体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主体的有力保障

从政府层面来说,新乡贤是助力政府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的“编外人员”,不仅扩大了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的主体队伍,同时也起到了“行政补位”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自上而下逐级推进,基层治理部门承担着实施落地的具体工作。然而,自农业税废止以来,基层治理部门对于落实相关政策等工作时常常出现“下沉”不到位的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得不到满足。村干部的动力来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性收益,另一方面是经济性收益。贺雪峰和阿古智子认为,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

① 福山的“信任半径”认为信任半径带来社会资本的占有,信任半径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资本也越多。

②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③ 谢安民:《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20年。

如果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sup>①</sup>自2006年农业税废止以来，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面临转型阵痛，经济利益也有所减少，因而在很多地方，面临着村中无干部的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编外人员”，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村干部的部分职责。此外，新乡贤与民众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新乡贤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多有交集，具有聆听他们现实文化需求的沟通渠道。因此，新乡贤可以将搜集汇总的文化需求信息提供给基层政府部门，有利于相关部门按需、按量供给。新乡贤的这一行动实际上补齐了基层政府部门在行政方面的不足，弥补了村干部与民众之间“悬置”的“最后一公里”，有助于提供民众喜爱、需要的乡村公共文化产品。

### （三）乡村社区的内部认同是新乡贤群体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重要推手

从群众层面来说，新乡贤可以成为乡村公共文化需求的“代言人”。新乡贤充当着民众“发声筒”的重要角色，他们对上表达乡民的基层文化需求，使得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更具“针对性”。正如梁漱溟所言，“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此。”<sup>②</sup>虽然乡村日常公共文化生活内容随着科技和信息发展有所改变，但公共文化的基本形式和价值追求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公共文化的供给必须依据具体乡村的具体情况而制定，不能“千篇一律”。在完善供给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当地乡风民俗，不能违背乡村社会规范，兼顾地方性的文化生活情感。大多数的新乡贤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乡村的文化禁忌都较为熟悉。他们可以向上反映哪些公共文化可以提供，哪些公共文化不适合乡村生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文化矛盾。不同的乡村因地理环境、方言区的不同，文化需求也存在差异。例如，苏州地区的民众对于昆曲、越剧的接受程度较高，但对于河南梆子等北方戏曲的喜爱程度就较低。基层新乡贤从中协助，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乡民微生活需要。新乡贤与一般民众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数接触过外界的文化，具有更高的文化包容性。通过把握乡村公共文化的多元民众需求，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才能有条不紊地得到持续推进。

### （四）新乡贤群体的身份定位是其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关键

从新乡贤自身层面来说，他们是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搬运工”，通过建设乡村公共文化不仅为他们取得了乡村合法的公共身份，同时也实现了文化赋值，提高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在传统社会，乡贤作为政治、文化、经济的集合体，可以深刻影响到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进程。对于地方上的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大多秉持传承、传扬的态度。对新乡贤而言，他们深受地方传统文化的熏陶，正是地方上的各种文化塑造了自身的文化品格。新乡贤结合自身

<sup>①</sup> 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sup>②</sup>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40页。

以及乡村的实际情况,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过程中积极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凸显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更为传统乡村文化寻找到了良性传承的土壤。“互联网+”作为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其缩短了现代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距离感,然而乡村中的大部分民众对于网络的运用能力较弱,无法享受到“互联网+”的红利。新乡贤往往可以成为连接现代文明的“纽带”,帮助民众了解网络、运用网络,从而享受城市中品质更高的现代文化供给。与乡村农家书屋和民间“草台班子”等传统文化资源相比,新乡贤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城市图书馆资源、各种文化小品、大型文艺演出和多层次艺术展演资源等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引入乡村,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水平,丰富乡村民众的精神世界。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给予了新乡贤奉献自己、回馈社会的机会,特别是在传统的乡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之间,他们担当着“搬运工”的文化角色,最大程度地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当前,许多乡村都已经成立了与新乡贤有关的组织,如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乡贤商会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都发挥着新乡贤的作用。这些组织的成立不仅使新乡贤群体的身份更加明确,赋予其身份归属感,更推动了行政结构从自上而下到横向多维的转变。系统化的组织增强了新乡贤群体的专业性,并为新乡贤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平台,甚至还会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成为新乡贤,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出一份力量。目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对当地传统公共活动的依赖性很强,因而新乡贤们热心于恢复传统的公共活动,通过对地方传统的回归,不断重申并提高组织能力,汇聚更多的人力资源投身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动员策略

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对新乡贤群体类型做出细致的区分,不仅源于摒弃了原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对单一权力主体之于乡村及社区所具有的“全能主义”的整体性掌控的依赖与想象,同时也是政府对新乡贤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动员策略之一。依照行为主体参与乡村公共建设的活动范围、资格获取、社会功能等不同逻辑,可将新乡贤群体区分为“富乡贤、文乡贤、德乡贤、技乡贤”四种不同类型,相应地对不同乡贤主体间的动员策略也应有所区分。

##### (一) 富乡贤应侧重经济资源的导入

新乡贤结构的再造过程与发生场域最初起源于我国华南及华东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地区,而且伴随着对于“富人治村”的资源供给能力的讨论,应注意从经济资源的导入视角展开“富乡贤”动员。富乡贤是指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为村民生活保障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



金及相关物质资源的乡贤类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并非仅仅停存于精神层面，地理文化空间的丰富也是承载并容纳精神文明的重要场域。通过兴建宗族祠堂、老年活动中心、公共健身广场、农家书屋等各类不同功能的公共文化场所，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筑牢了物质根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发家致富的乡村精英对家乡的情感所寄以及责任所依，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捐助了大量资金。在南京地区部分乡村，当地富乡贤们每年定期资助社区内的优秀学子、贫困儿童、孤寡老人及残障人士，解决他们在生活、求学、养老等方面的物质需求。此外，当地政府还鼓励富乡贤群体们募捐建立了一批如裴家同艺术馆、庞瑞垠文学馆、聂震宁阅读中心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这些都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sup>①</sup>为了让捐助的资金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浙江西宸村，富乡贤们利用自身对财产增值的专业知识，集资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文化本金投入银行，将所产生的利息用于困难家庭及孤寡老人的日常生活。<sup>②</sup>因此，乡村要充分利用富乡贤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借助富有“人情味”的创新创业环境，保证公共文化产业扶持、土地承包、金融保险、税费减免、融资贷款、中介服务相应的手续政策上的优待优惠，构建良好的“富乡贤”动员机制。同时，要充分协调利用富乡贤带来的产业升级转型效应，不断培育新的多重经营主体合作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逐渐实现由外部支持性经济资源转为内生性经济组织系统的构建。

### （二）文乡贤应侧重乡土文化的传承

文乡贤是指那些受过系统教育或文化水平较高的新乡贤群体，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热衷于收集地方故事、挖掘地方文脉、从事地方志撰写等工作，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一个地方都拥有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是特定的“风土”所决定的。应当充分动员文乡贤参与乡土文化的传承工作。因为村庄在不断发掘、记录、继承原有的传统乡贤的精神遗产，在接续乡土社会历史性同时，更要不断凝练、塑造、培育符合时代特色的新乡贤文化内涵。选贤与能是古今乡贤文化的共同底色，过去地方上的乡绅无论大小，共同主管各种公共文化事务，诸如修桥、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堂与书院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参与地方公共祭礼活动等。<sup>③</sup>及至现代社会，文乡贤的职业大多为教师、会计、医生、学者等，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积极从事地方志的撰写，挖掘传统的地方文脉与故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歌谣等，深受村民们的欢迎与喜爱。此外，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方面，富乡贤提供建设资金，文乡贤

① 访谈对象：王晓斌，当地乡贤；访谈人：马海娅。访谈时间：2019年8月；访谈地点：南京市江宁区茶岗社区。

② 张兴宇、季中扬：《“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为空间的建设出谋划策,以提高乡村的文化建设水平。乡村公共文化的兴盛不仅可以提升地方民众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可以带动一方人才的集中智力,将乡村公共文化提升为地方文化名片,从而推动家乡的发展。因此,他们常年致力于当地文化资源的挖掘,近年来兴盛于各地的地方志撰写工作正是这一体现,通过文集的汇编,将地方上所流传的民间故事、古老歌谣、家族传统、人物事迹、壮美风景等一一记载。如在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当地新乡贤群体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马庄香包,不仅将此技艺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将其打造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名片,同时以文化赋值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之一。<sup>①</sup>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村落成员对故土的文化失去了信心,村落认同感由此丧失,<sup>②</sup>文乡贤们通过对当地文化的再次挖掘,让这类迷茫的群体重拾信心,对乡村认同感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乡贤群体充分了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容与诉求。因此,依靠文乡贤“自体循环式”的运作手段,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促进会等民间组织来营造乡贤文化的浓厚氛围,如建设乡贤长廊,进行乡贤事迹宣传展示。通过地方转让部分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组织与责任主体,将文乡贤的建议、建言与监督纳入乡村基层组织常态化管理程序之中,又能反向作用于文乡贤群体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如福建省福鼎市澳城村在每年举办的大型“双端午”节日民俗活动中,与村中原有的“福头”组织协商办会。

### (三) 德乡贤应侧重乡风文明的涵育

“三治融合”内涵村庄依靠“德治”获得秩序的稳定与重组,乡村德治实践不仅通过具有共享意义及象征价值的族规家谱、村规民约得以实现,还需要具体乡村精英的参与。德乡贤虽在物质条件及文化水平上不及富乡贤与文乡贤,但在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德行较好的村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在沟通公共事务、调解村民矛盾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乡风文明的涵育层面,德乡贤具有明显的身份优势。道德示范与约束,可以重塑村民们的价值观念,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sup>③</sup>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乡村是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因此“基于这种彼此的熟悉,以传统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内部有着较高的人际信任度和共同的道德准则,并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sup>④</sup>德乡贤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以自身较高的道德行为带动村民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传

① 《江苏徐州马庄村:小香包做成大产业 村民致富信心足》,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2021/09/07/ARTI1gO9VZ3VYMvsNRt0coIA210907.shtml?spm=C94212.P4YnMod9m2uD.ENPMkWvfnaiV.138>, 访问日期:2022年6月21日。

② 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③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 王璐璐:《从“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与重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承,从而提升整个村落的道德水平,平日以德行垂范于乡里的新乡贤大多是地方社会规范实践的引领者,一定程度上能够受到民众的认可;第二是以道德为评判标准,调解乡村中出现的矛盾冲突、约束村民们的行为规范。通过表彰、奖励的形式,鼓励德乡贤行为示范、引领带动,实现充分彰显传统礼俗在当代乡土社会中所发挥的道义整合利益的群体示范作用。重塑人本亲善的乡村治理灵魂,丰富礼法结合的乡村治理方式、完善服务导向的乡村治理保障。<sup>①</sup>在农村网格化管理的地方实践中,引导新乡贤的“德治”优势转化为基层乡村社会“网格”治理效能。<sup>②</sup>

### (四) 技乡贤应侧重乡村文化产业的带动

技乡贤是指在某一专业技能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能力,且获得了一定专业成就的乡贤群体,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地方乡土人才、合作致富带头人等,技术型乡贤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所掌握的技能积极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以民间手工艺为代表的乡村特有的文化技艺,不仅表现为精湛缜密的手艺技巧,也与地方文化构成相互缠绕的组织系统。因此,关注技乡贤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民间特有技艺唤起民众对乡土文化的眷恋,与城市由单向流动转向互相补充。在福建省福鼎市双华村,当地文乡贤之一——畲族木偶团团团长钟昌敢,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编写剧目的创作才能,将国家宣传的疫情防护要点编写在演出木偶剧目当中,利用畲语进行表演。乡民在观看木偶戏的过程中了解到疫情防护卫生知识,解决了村中疫情防护的宣传难题。<sup>③</sup>农民画是南京六合区地区的代表性技艺,因其大胆的色彩运用、丰富的绘画结构、反映农民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而深受地方民众喜爱,已成为当地常见的文化宣传手段。在当地,农民画传承人们不仅掌握着农民画技艺的精髓,同时也是一批热爱家乡、有志于为家乡贡献力量的文化群体,因此当地将其纳入技术型乡贤的范围中。<sup>④</sup>通过与技乡贤合作,开展长期稳定的技艺培训,如各地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让技艺能够真正在乡村充分活跃涌动。

资格的获取与准入原则,虽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群体间的边界,但新乡贤的群体包容性,则进一步消解了群体间的区隔,延伸了主体以群体划分形成的社会责任。对不同新乡贤群体的认定,不仅能够有针对性发挥人才的最大效能,也能够进一步培育动态的、长效的新乡贤人才培育机制。新乡贤群体们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中来,解决了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人才凋零与缺位的难题得以被化解。他们根据自身的能力,立足于自身优

① 刘淑兰:《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

② 张兴宇、季中扬:《礼俗互动:农村网格化管理与新乡贤“德治”协同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材料由福建省福鼎市佳阳畲族乡文化站站长王真真提供。

④ 管哲、蒋乐畅、喻先萍:《六合东王社区传统节日传承状况及农民画调查报告》,《南京七村传统节日文化田野调查专辑(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内部出版)》2020年第1期。

势,通过“富、文、德、技”四种不同的路径,积极运用自己的智慧,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并从多方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的全面发展。

在明确新乡贤标准及差别的同时,也需要保证差异性的统一,新乡贤仍旧是乡村共同体的成员,在团体格局之内,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是“相同”的。<sup>①</sup>因此,除上述提及针对“层内的差异”的动员逻辑以外,还要讲求“层外的统一”,即需要建成灵活的乡贤联络沟通渠道和长效稳定的情感联络机制,这也是维系乡贤与村庄之间的主要桥梁。如吴晓燕、赵普兵<sup>②</sup>提到的,在浙江金华地区开展的“2018乡贤大会”及各类的“乡贤夜话”沙龙、茶会等活动,邀请乡贤与村委、学者“夜半议乡村振兴”。由此,才能保证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动员策略不会进一步“脱轨”,成为悬置的空壳。

## The Main Selection and Mobilization Logic of New Rural Sag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HUA Qian ZHANG Lihua

**[Abstract]** As a key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mainly faces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landing”: Firstly, the main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re not high; Secondly, the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some rural areas is unbalanced, deviating from the daily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people; Thirdly, there is a lack of rural cultural talent resources, and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insufficien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t present, in some rural areas in China,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attract new village sage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human resources for village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far as the mobi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new rural sage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is concerned,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resources and ident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wealthy, cultural, moral, and technical”.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 different types of new rural sage groups are included in the overall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n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its and new rural sage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Rural Public Culture; New Rural S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Mobilization Tactics

(责任编辑:朱瑞)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5页。

② 吴晓燕、赵普兵:《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理论探讨》2019年第4期。